

# 出土文献研究,打开历史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池 骋



《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  
陈侃理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  
罗新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罗新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历史书写如何创新,是史学界的重要议题。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基人之一,傅斯年有“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说法,将扩充史料视作促成史学进步的重要手段。而最近100多年,随着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史料确实大为扩充,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北京大学历史系陈侃理副教授主编的《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和罗新教授主编的《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就是两部尝试超越老套路,围绕出土文献,对历史进行“再书写”的新著。它们既体现了当代学者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思路和新进展,也为突破传统的历史叙事打开了另一种可能。

## 价值:从“平等对话”到“图景重建”

提到“文物”,一般人最容易想到的是青铜器、玉石、瓷器、雕塑、书画等。这同我们的日常经验有关。我们逛博物馆、艺术馆时,它们都是常见展品;翻阅相关书籍,也多有浓墨重彩的介绍。与这些直观且便于陈列展示的事物相比,出土文献就很难进入公众视野了。可以设想,倘若一座博物馆里尽是简牍、帛书、墓志、碑铭,那么普通观众大概率会看得一头雾水,“劝退”效果十足。但是对专业人士来说,就如同老鼠掉进米缸,幸福感拉满。因为他们深知,出土文献之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我国古代即以青铜器铭文和石刻碑碣等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它由北宋欧阳修开创,历经数百年,在清代乾嘉学派上蔚为大观,涌现出钱大昕、毕沅、翁方纲等一众大师。不过,金石学的宗旨是“证经补史”,即证明儒家学说,为史学查漏补缺。这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卫道士,学者再努力,也不可能突破这块天花板。因此,无论本体还是方法,金石学都跳不出传统套路,构不成一门独立学科。现在普遍把金石学视作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既为“前身”,和真正的考古学之间还隔着了一道墙。

第一次试图推倒这堵墙的,是大学者王国维。时值清末民初,郑州、安阳一带发现大量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王国维就是最早投身破解甲骨文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期间,王国维开设《古史新证》课,倡导“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指“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互相阐发,有助于解决上古史中的诸多谜团,如夏朝是否存在、殷商都城的位置及商王世系等。

二重证据法赋予出土文献独立价值——它不仅仅是现有传世文献的补充,更是获得了与传世文献“平等对话”的资格,从而推动历史研究。凭借解释力强等优势,二重证据法成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本范式。

晚清以来,越来越多在地底沉睡的文献重见天日,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在二重证据法“加持”下,出土文献摆脱了金石学的附庸地位,自立门户。对此,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张固也《先秦诸子与简帛研究》等新著均有阐发。

## 好书过眼



《五角场的五只角》  
周建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五角场的五只角》一书,收录了作者周建新创作的50余篇叙述五角场前世今生的非虚构纪实作品,阅读后不由得让人眼睛一亮。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些文章是周建新温情敏感心灵里开出的朵朵鲜花,是他智慧眼睛观察考据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他几十年建立起的对五角场深厚情感的真情倾述。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不过百年历史,上海的江湾五角场经历了几起几落,如今已从尘土飞扬、房屋破旧的市郊“下只角”,变成高楼林立、商业繁华的城市副中心。尤其进入新世

纪以后,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合生汇、万达广场、百联又一城、东方商厦、苏宁电器等商业巨头先后开业,霓虹闪烁,五光十色。环岛上架起一座座形似飞碟的钢铁彩蛋,这是视觉艺术家陈逸飞生前设计的最后一件雕塑作品《科技之门》。

这本书中的文章,细致地记录描绘了发生在五角场的巨变,有些文章是作者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心灵受到震撼有感而发;有些文章是在收集资料、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再去踏勘现场,看今忆旧,夹叙夹议,抒发心中感想。比如,在《我在五角场Citywalk》《漫步在翔殷路》等文章中写到,在邯郸路近国福路,作者联想到《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先生;在翔殷路海研所门口,作者联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在此脱下自己的手表,一边看秒针,一边数着潜水员的脉搏;在共青森林公园,当时被称作“共青苗圃”,担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曾亲自到这座苗圃召开现场会,还带头亲手栽种了一棵果树苗;路过苏宁易购广场,作者想起了与自己共度两年军校

## 格局:在腾涌的烈焰旁“重写历史”

数十年来,在用出土文献进行图景重建方面,中外学者取得了诸多进展,有的步子迈得还很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一书中抛开真伪难明的“上古典籍”,利用铜器铭文研究周代政治和官僚制度。李峰的另一部著作《西周的灭亡》综合运用考古发现、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考察西周的解体过程。两部著作均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出土文献的“爆发区域”,秦汉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

在传统史学中,秦汉史本就占据独特地位。“前四史”里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都属于秦汉史范畴,它们塑造了两千多年来国人对秦汉时代的基本认知。现代历史学家固然可以在视角和方法上创新,但原材料依然脱不出这三部大书,陆穆、吕思勉、翦伯赞等人的《秦汉史》莫不如此。这决定了他们的书写或有新意,却难有飞跃。

好在不断涌现的出土文献改变了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况。当代学者掌握的材料已经远远超出旧史,换言之,我们能得到司马迁、班固、范曄等舍弃,或连他们也未看过的材料。这为“重写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侃理主编的《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对此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在序言里,陈侃理概括了出土文献研究结出的硕果。当前,秦汉出土文献的总字数以百万计,涵盖屯戍、行政、经济、礼仪等各个方面,“时代自战国末以迄东汉晚期形成完整序列,地域分布从西北边境扩散到大江南北,制作、抄写和使用下到戍卒、小吏,上至王侯显贵”,其丰富程度远超外界想象。尤为重要的是,经过几代学者的整理、考订、阐释,“出土文献已经进入到了秦汉史的主流论述,新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用了简牍资料”。

不过陈侃理坦言,研究方法尚有改进空间。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仍未跳出“证经补史”的窠臼,似乎出土文献只为印证传世文献和主流论述而存在,若两者发生龃龉,则削足适履,使之强行合拍。

幸运的是,得益于前辈的开拓、资料的喷涌,加上更系统的教育,年轻一代学者的视野和格局已大为拓展。陈侃理本人就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青年学者,此次主编《重写秦汉史》,更是汇集众多80后学人,来了一次“集体巡礼”,展现出中国史学界后浪推前浪的勃发景象。

全书共九章,每一章的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一线学人。他们分别从文字发展、文书行政和律令法系、徭役和军事制度、政区地理、信仰世界及时间秩序等维度,勾勒出过往秦汉史研究忽略的面向。其中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陈侃理在序言里揭示的,随着复杂的细节从出土文献中喷涌而出,很多既存事实不再不言自明,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张力也越来越彰显。这对于今人在大一统迷思之外,开辟重新审视秦汉史的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这样浩大的工程绝非一本著作所能完成,毋宁说,书名“重写秦汉史”是一种展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诚如陈侃理所言:“本书仅代表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之时,一部分目击者的视角和思索——如同站在喷发中的火山旁边,观察烈焰腾涌,岩浆奔流,想象未来将会升起怎样的地平线。”仅仅是描摹这幅壮阔绚烂的前景,已足以令人向往。

## 意义:为“被消音”的个体找回公道

有必要指出,学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照,搜寻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差距,并不是为了推翻千百年来定论。出土文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打破一元化的历史叙事,延展更多

样的视角和认知,从而走出“唯一真理观”(陈嘉映语)。如果学者只是孜孜以求翻案,则相当于从这个“唯一真理观”滑向另一个“唯一真理观”,表面新颖,实则并未突破老套路。

实际上,出土文献能在多个维度为今人提供新知。以《重写秦汉史》为例,北京大学副教授田天撰写的第七章《信仰世界》,依据出土文献探讨古人的疾病观、身体观及其信仰内核,将触角伸向秦汉社会的心灵家园。这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信仰结构和精神状态是颇有助益的。

当然从整体而言,《重写秦汉史》的诸位作者更关注行政文书、军事制度、政区地理等宏观和中观层面,于微观史、个人史尚不重点着墨。其实这同样是出土文献有机会大放异彩的领域,而且往往更能引发普通人共鸣。

2022年,罗新教授推出《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上世纪20年代,洛阳出土一方墓志,墓主人是北魏一位法号叫慈庆的比丘尼,于86岁的高龄在洛阳昭仪寺去世。传世文献里没有任何有关慈庆的记载,她的一生又实在平凡,因此墓志并未得到重视,继续湮没无闻。罗新独具慧眼,将墓志与史书、宫廷档案等结合,从历史的缝隙里钩沉线索,拼凑出慈庆的人生遭际和她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漫长的余生》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与阐发,呈现出被现有材料有意无意过滤掉的小人物的命运,而这在传统史学叙事中原是常态。它让我们透过宏大叙事的包裹,看到一个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鲜活个体。

显然是意犹未尽,近日,罗新又主编了《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罗新指出,一般而言,社会上男女人口各自的数量是比较接近的,然而出现在史书里的男女比例相差悬殊。这表明,在古代社会,“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历史编纂之外的”。庆幸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北朝墓志中女性墓志占比颇高,这为今天的学者将曾经遮蔽北朝女性的面纱揭开,把他们拉回历史视域提供了契机。

本书所收11篇文章,利用新出墓志,佐以石刻、史书等材料,描绘了11位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书名中的“彼美淑令”源于一位柔然公主的墓志。这位16岁嫁到东魏,担负和亲之责的公主,墓志说她“彼美淑令,时惟妙年”,活脱脱一个美丽贤淑的妙龄少女。可惜“生之不吊,忽若吹烟”,因难产或生产染病,19岁就死了,犹如一缕轻烟随风飘散。

像柔然公主这样的人,历史上不知凡几,即便贵为王孙,也终究是政治拨弄的工具。如果沦为“罪臣之女”,那就更不幸了。在《寻找仇妃》一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冲从一方不起眼的墓志中钩沉出北魏仇妃的灰色往事。仇妃幼年时因生父仗诛,入宫当罪奴,后来朝廷将她赐给南安王元桢为妃。从罪奴到王妃,看似逆袭,其实细究起来,仇妃一生只是被动服从,未曾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恐怕是岁月长河中大多数人的普遍境遇。

出土文献之于微观史的意义亦蕴藏其间。如罗新所言,它们以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形态,为“那些被隐藏被遮蔽被消音”的个体生命,找回了一点点公道——那是来自当代读者的观照与共情。

在这个知识迅速更新换代、信息量爆炸式增长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逐渐适应了被各种数据流和算法逻辑所环绕的生活方式。然而,拜伦·里斯的《故事、骰子和会思考的石头》以其独到的视角,邀请我们重新探索和思考人类智慧的起源、成长及其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这本书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人类过往历程的简单回顾,而是透过历史的深邃眼光,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深刻的思考与前瞻。

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人类为何能从众多生物中脱颖而出?人类的思维是如何形成的?又是什么造就了人类思维的独特性?通过这些问题探讨,里斯带领读者穿越时空,从200万年前生命的起点,一直到21世纪人工智能的兴起,将历史、科技、叙事和概率融合,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结合我们在智能领域的研究,有一些有意思的观点跟各位读者共享。

## 故事:人类心智的觉醒

在《故事、骰子和会思考的石头》中,“故事”一词被赋予了超越字面的意义,它不仅是沟通的媒介,更是人类心智觉醒的神圣火种。它如同一股潜流,贯穿从200万年前古人类的脚步直至今日的文明演进之中,激发了人类独有的心智时间旅行能力。这种能力,宛若一把神奇的钥匙,解锁了我们对过去的追溯与未来的畅想。它使我们得以在记忆的长廊中徘徊,从昔日的篝火边汲取智慧,又在想象的画布上绘制未来的图景。正是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在动物界中独树一帜,构筑起错综复杂却又辉煌璀璨的社会结构与文明的大厦。

在拜伦·里斯的笔下,“故事”成为了一种艺术、一种力量,它不仅承载着信息的传递,更是人类智慧与情感的共鸣。书中的“故事”部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力量。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人类心智觉醒的催化剂。从远古的觉醒到现代的自我认知,语言让我们拥有了心智时间旅行的能力,能够回忆过去、预测未来,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自由穿梭。

## 骰子:概率论与现代世界的构建

“骰子”部分以其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概率论在构筑现代世界中的核心作用。自17世纪法国的数学家们首次系统地阐述概率论起,这一理论便成为了我们解读与预测未来的强有力的科学工具。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更在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变革。概率论的诞生,如同在混沌中点燃了一盏明灯,为我们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导航。它使我们得以量化风险,评估可能性,从而在变幻莫测的未来面前,不再盲目航行。

事实上,概率论与目前大家关注的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深度学习的模型需要处理大量的随机数据,并使用概率论来描述和优化这些模型。例如,贝叶斯定理是概率论的一个重要定理,它描述了给定新信息后,原有概率的更新,这在深度学习中有重要应用。

“骰子”篇章所展现的概率论,不仅是数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更是现代世界构建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它让我们在面对未知和变化时,拥有了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了深刻的理解和应对之道。同时,概率论与深度学习的结合,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使得机器能够更好地模拟人类的智能,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并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可以看出,“骰子”象征着我们对未来的不断探索和预测,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探索和冒险,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 会思考的石头:人工智能的未来

“会思考的石头”篇章以其深邃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未来及其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已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概念,而是成为现代社会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这些被称为“会思考的石头”的智能体,不仅能够高效地处理和解析海量复杂数据,更在模拟人类的思维模式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们在特定领域内展现出的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人类的极限,这让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潜能和未来充满无限遐想。

我的新书《具身智能》(中译出版社2024年出版)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事实上具身智能的崛起,正在成为人工智能科技体系的集大成者,也就是成为“会说话的石头”的现实意义的版本。具身智能不仅仅是对机器人物理形态的智能化,它更是一种哲学和认知科学的融合体现,强调智能的生成与发展源自智能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具身智能所关注的“身体、大脑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模拟人类的学习方式,使智能体在物理或虚拟环境中,通过互动完成复杂任务的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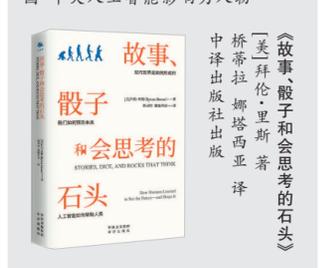
最终,具身智能的高级形态将与通用人工智能发生重叠。或者说,具身智能的高级形态将是通用人工智能的一种倾听,阅读。

在 读

# 「会思考的石头」:人工智能的未来



李志毅,中国人工智能领军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清源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具身智能专委会委员,2024年入选福布斯中国“十大人工智能影响力人物”



《故事、骰子和会思考的石头》  
拜伦·里斯 著  
陈彦 译  
中译出版社出版

物理学的存在方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哲学的深入探讨,我们或许正一步步接近于揭示机器意识的奥秘。通过引入更高层次的抽象、探索迁移学习、强化学习以及元学习等策略,我们有望培养出能够超越数据限制、自主学习和适应新情境的智能体。在不断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冲击之下,在日益崛起的具身智能新物种的竞争之下,人类正面临着与具身智能,特别是智能机器人共处一个地球或者外星的全新时代。面对这一挑战,人类需要以更为清晰的认知、更积极和主动的态度面对和准备通用具身智能时代的来临。这不仅是对于技术极限的追问,更是对智能本质的哲学探索。简而言之,“会思考的石头”代表了人工智能的崛起,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在拜伦·里斯的笔下,“思考与反思”不仅是对过往知识的回顾,更是对未来智慧的探索与质疑。他通过书中的三个篇章,探讨了人类智慧从觉醒到辉煌的宏伟图景,同时也抛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这个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在技术进步与坚守人类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又如何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最终成为人类的福祉,而非潜在的威胁?

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将代表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

故事、骰子和会思考的石头,对应了三个隐喻,不仅讲述了人类智慧的发展历程,更激发了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无限遐想。而书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的思考,引导我们在快速发展的科技浪潮中,不忘自省与前瞻。它们挑战着我们对技术、人性和技术的固有认知,促使我们去探索,去质疑,去重新定义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